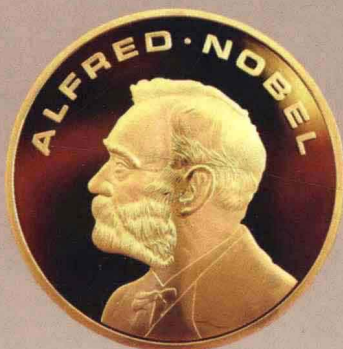


大獎評選後面的五個秘密!

Five secrets behind the Selection of Nobel Prize !



星野 著

你不知道的諾貝爾和平獎

The Nobel Peace Prize You Don't Know



你不知道的諾貝爾和平獎

The Nobel Peace Prize You Don't Know

大獎評選後面的五個秘密

Five secrets behind the
selection of Nobel Prize

星野 著

三思文商傳訊有限公司出版

你不知道的諾貝爾和平獎

The Nobel Peace Prize You Don't Know

大獎評選後面的五個秘密

Five secrets behind the selection of Nobel Prize

出 版：三思文商傳訊有限公司

澳門沙梨頭海邊街28號新昌工業大廈13樓

電 話：(853) 2878-2432

傳 真：(853) 2878-1587

電 郵：adm_cccmm@yahoo.com.hk

作 者：星 野

發 行：三思文商傳訊有限公司

第一次印刷：2010年12月

版 次：2010年12月版

印刷量：5000本

字 數：420,000字

國際書號：ISBN 978-99937-712-1-0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翻印

售 價：港 幣 / 澳門幣120元

作者簡介

作者是旅居歐洲的資深國際問題和全球發展問題專家，其主要研究領域為和平、發展、民主和人權。作者對當今國際政治發展趨勢，既有宏觀理論把握，更有身體力行的實務經驗，20多年來，足跡遍佈全球，經常為各國政府提供政策分析和諮詢；是溝通東、西的橋樑、國際非政府新型外交的倡行者。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在2008年完成的著作（出版前補充若干最新材料），它通過剖析羅馬教皇保羅二世連續10年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而不得的三方面原因，深入追溯和平獎這樣一個在國際社會裏呼風喚雨、引領風騷的千萬瑞典克朗大獎的評獎歷史，分析候選人的評選機制及其評選標準的演變，旨在證明，冷戰後的和平獎頒獎，擺脫了諾貝爾遺囑裏三條標準的約束；頒獎的目的，是要以此來引導國際媒體關注新的、熱點地區和熱點議題，不斷改變和強化西方強權制定的國際政治遊戲規範，在大英帝國覬覦的戰略要地和資源富有國家裏顛覆其政權，把整個世界整合到一種以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為號召，以市場經濟和以多黨競爭為主要特徵的西方文明中來。

不只是和平獎，諾貝爾文學獎也是一種政治工具。這兩個獎項，往往以對重大事件回應的方式來表達、宣示西方國家的觀點和立場，通過對特定地區的人物的頒獎，明示或暗示西方國家對這些地區的戰略企圖，為英、美製造輿論、打擊對手，哄抬道德聲勢，陷敵於不義。它們經常被用來當作攻陷那些對英國來說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或地區，把它們收編到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中來的重要炮彈或韁繩；頒獎被當作接納一個國家進入西方文明俱樂部的象徵和符號。和平獎頒獎，深受大英帝國的巧妙操縱和影響，是挪威推進英國的外交政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

本書通過分析過去10年世界各國解密的新的檔案史料，以第一手的材料和案例，從全新的角度為讀者解讀20世紀國際關係史當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書中當時的描述和預測，都得到了近兩年國際形勢發展的驗證。

目錄

前言	003
教皇保羅二世逝世引爆的話題	008
壹，諾貝爾和平獎的意義及其巨大影響	012
一，諾貝爾和平獎引領世界潮流	014
二，頒授諾貝爾獎的真正目的	029
（一）英、美對緬甸的反攻倒算	030
（二）在阿根廷打開“民主化”缺口	035
三，他們為甚麼不能獲得文學獎	039
（一）文學獎的“文字含金量”	041
（二）《齊瓦戈醫生》獲獎的奧秘	059
（三）諾貝爾獎在促進非西方國家轉型時的頒獎模式	078
四，諾貝爾和平獎的價值取向	083
貳，諾貝爾和平獎的設立及其發展	094
一，諾貝爾的三大重要發明	095
二，諾貝爾獎的設立和管理	099
三，諾貝爾設立和平獎而捨棄數學獎	104
四，為甚麼由挪威來頒發？	110
五，獎金金額的演變：誰拿了多少錢？	111
叁，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及其外部勢力干預	114
一，諾貝爾和平獎與外界影響	115
二，和平獎提名過程中的較量	120
三，和平獎百年評選獨缺甘地	127
四，克格勃力阻異議人士得獎	134
（一）赫魯曉夫曾經覬覦和平獎	134
（二）前蘇聯異議人士的崛起	138

目錄

(三) 薩哈羅夫緣何跟當局決裂·····	145
五, 和平獎的評選標準及其演變·····	156
(一) 早期獲獎的三類和平組織和人士·····	161
(二) 建構和平的第三條道路: 建立法律規範·····	192
(三) 從人道主義救援到“‘人道主義’干預”·····	205
(四) 人權理論和實踐的曲折發展及其迷思·····	227
肆, 教皇保羅二世為甚麼不能獲得和平獎·····	259
一, 教皇保羅二世其人及其政策·····	263
(一) 教皇保羅二世是現代主義和女權主義者的天敵·····	268
(二) 教皇保羅二世是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仇敵·····	280
(三) 保羅二世同雷根勾結建立反共同盟·····	288
(四) 保羅二世插手南斯拉夫內戰·····	296
二, 歐洲三大民族三種宗教的鬥爭·····	300
(一) 拉丁民族的崛起與天主教的發展·····	309
(二) 日耳曼民族的發展壯大與新教的傳播·····	315
(三) 斯拉夫人/東正教跟拉丁民族/天主教分庭抗禮·····	319
三, 2000—2005年和平獎候選人情勢分析·····	353
(一) 2000年: 南、北朝鮮和平進程取得重大突破·····	356
(二) 2001年: “9·11”事件改變世界歷史發展進程·····	363
(三) 2002年: 借反恐鏟除異己美軍攻克阿富汗前進中亞·····	375
(四) 2003年: 侵略伊拉克, 英、美陷眾叛親離境地·····	386
(五) 2004年: 美國覬覦伊朗石油, 借反恐深耕布防·····	400
(六) 2005年: 廣島轟炸60年後核競賽猶如脫韁野馬·····	412
伍, 結語·····	429

前言

（一）本書寫作緣起及目的

本書寫作始於2005年4月3日，在羅馬教皇保羅二世辭世以後，完成於2008年5月北京奧運會之前，從2005年到2010年，是中國崛起最強勁、國際風雲最動盪的五年，本書其中許多分析和預測在這五年間都成為事實。因此，在現在出版之時，特別保留原來的內容，而不做修訂。

本書通過剖析教皇保羅二世在從1995—2005年這10年間以教皇之尊連續10次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而不得的三方面原因，深入探討和追溯諾貝爾和平獎這樣一個在國際社會裏呼風喚雨、引領風騷的千萬瑞典克朗大獎的評獎歷史，鞭闢入裏地分析和平獎獲獎者的產生過程；揭示得獎人的評選產生機制及其評選標準和頒獎模式演變；分析挪威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各種各樣的政治、歷史、人文、地理等等因素對評審和平獎得主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旨在證明，過去百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評選的和平獎，深受大英帝國的嚴密操縱和巧妙影響，是推進英國外交政策目標、在大英帝國覬覦的戰略要地和石油資源富有國家顛覆其政權的有力工具。

過去幾十年，中國國內一些上層政治精英和許多知識份子對西方國家以推行民主、弘揚人權等等漂亮、時髦的口號來包裝的新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盲目附和，隨聲唱和，但西方政客在爭奪國家戰略利益時顯然比這些只有羨慕而沒有立場的渾渾噩噩的書呆子要清醒得多。表面上，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和多黨競爭的民主政制，但實際上，它們擁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追求不同的國家利益。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爭奪市場和控制資源，在過去幾百年裏在全球展開了全面爭奪和殊死較量。在19世紀時，這種爭奪表現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球範圍內對勢力範圍和原料產地的爭奪，在冷戰中則是以防止社會主義國家“輸出革命”為旗號，在前蘇聯和中國周邊建立圍堵的形式出現；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和英國又以“捍衛民主”、“保護人權”的名義來“打擊邪惡軸心”，製造“顏色革命”，在他們覬覦的戰略要地裏扶植、建立起各種各樣的親西方傀儡政權。為此目的，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經常被利用來作為推廣、促進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念和制度主義理念的工具和手段，獎勵那些對西方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裏的失意知識份子或失勢上層精英，鼓勵他們拋棄本民族的文化和傳統，割裂自己的歷史，挑戰當局和權威，在西方鼓吹的“人權”、“自

由”等等時髦、抽象概念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治認同。

本書通過分析過去10年世界各國解密的新的檔案史料，以第一手的材料，以親身經歷的觀感、從全新的角度，引領讀者穿越歷史時光隧道，為讀者解讀20世紀百年國際關係史當中發生的許許多多重大歷史事件，釐清國際政治領域中諸多似是而非、顛倒黑白的觀點和理念，把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幫助讀者認清西方新、老殖民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獨霸全球、把全世界統一到一種“自由的專制”下來的目的，認清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長河中的位置，把握中國在複雜的國際政治鬥爭中的發展方向，韜光養晦，以逸待勞，推動中國的和平發展。

本書共分三部：第一部分通過介紹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機制及其標準的演變和發展，旨在證明：和平獎發展到今天早已擺脫了諾貝爾遺囑裏規定的三條標準的約束，頒獎對象也早就超越了遺囑裏規定的三類人；頒發和平獎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單純獎掖那些為推動裁軍、維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為促進國家或民族間友愛的人士，而變成要引導國際媒體關注新的、熱點地區和熱點議題，不斷改變和強化西方強權制定的國際政治遊戲規範，其最終目的是以此為手段，匡正、引導國際輿論，把整個世界整合到一種以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為號召，以市場競爭調節資源配置和以多黨競爭來規範權力遊戲為主要訴求的西方文明中來。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往往以對重大事件回應的方式來表達、宣示西方國家的觀點和立場，通過對特定地區的人物的頒獎，明示或暗示西方國家對這些地區的戰略企圖；與此同時，和平獎和文學獎經常被當作攻陷那些對英國來說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或地區、把它們收編到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中來的重要炮彈或韁繩，頒獎被當作接納一個國家進入西方文明俱樂部的象徵和符號。在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首推西班牙、日本、南非、俄羅斯和東帝汶，其次則有希臘、土耳其、韓國和埃及。在和平獎和文學獎的嘉獎、鼓勵下，這些非西方國家都完成了洗心革面、脫胎換骨，“脫亞歸歐”、“脫非歸歐”，融入西方文明的過程。在這樣的目的指引下，舉凡在地緣政治上稍有點重要性的國家或地區，或是屬於英聯邦國家的人士，只要是敢於挑戰權威，挑釁當局，聞雞起舞，迎合西方“政治正確”的口味的，就人人有希望，反之則個個不可能。二戰時，邱吉爾在同史達林談判瓜分“東歐”國家所出示的那張分贓圖，解釋了這些國家的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分佈奧秘；同理，冷戰後，西方國家對伊斯蘭教國家的覬覦，又使得一票莫名其妙的作家，如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穆克^①、旅法敘利亞詩人阿里·艾哈邁德·塞得、旅法阿

①奧爾罕·帕穆克獲得了200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爾巴尼亞作家卡達雷、尼日利亞作家奇努亞·阿切貝、印尼小說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努魯丁法拉赫和秘魯裔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等人，在一夜之間變成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

（二）諾貝爾和平獎的本質和頒獎的目的

世人對於諾貝爾和平獎的認識有一個盲點，即以為和平獎是對推動或維護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貢獻的傑出人士的一種嘉獎；在許多人心目中，諾貝爾獎，尤其是和平獎，是非常崇高、實至名歸的一項世界性大獎，因為它超然、中立，不受外界的政治影響或誘惑，而只憑委員們的良知與判斷，頒授給那些對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士。然而事實不盡如此。仔細審議過去百年的獲獎者名單，一個揮之不去的疑惑就是：為什麼諾貝爾和平獎獲獎者95%以上全為歐美、白人、男性？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審是否有偏見？得獎又有什麼訣竅？為什麼同是人權鬥士，南非黑人曼德拉繫獄27年，受盡折磨，金大中也是九死一生，但和平獎就是“光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以致分別苦等了二十七年和十三年，而緬甸的昂山素姬，一輩子沒有任何民主的追求和和平的信仰，她只是在1988年從英國趕回仰光照顧病危母親，因緣際會，趕搭上緬甸民主選舉的順風車，在家鄉振臂一呼，就一夜成名，諾貝爾和平獎馬上從天而降！20世紀最著名的非暴力革命哲學的創始人、印度的甘地從來沒有得過和平獎，而在上任後僅僅宣佈了要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的計劃，結果反向阿富汗增兵的奧巴馬總統卻立即獲得了和平獎。是甘地、曼德拉生不逢時，還是昂山素姬、奧巴馬三生有幸？面對這種種奇怪現象，諾貝爾委員會主席賽耶斯達德先生倒是直言不諱：諾貝爾和平獎是政治性大獎，評審是政治決定，頒獎會產生政治影響。因此，委員們評選時更多的是從政治上考慮，而不是做哲學思考和學理推敲。

諾貝爾委員會給薩哈羅夫、圖圖大主教、瓦文薩、昂山素姬、艾巴迪這樣的人物頒獎，常被西方媒體解讀成是挪威敢於挑戰強權、伸張人權的明證，其中，馬丁·路德·金、薩達特和拉賓等人甚至遭人暗殺。但諾貝爾和平獎與文學獎實際上是被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嚴密、巧妙操控，用以推進他們的意識形態的工具。諾貝爾委員會在這樣做的時候，是自覺甘當大英帝國的馬前卒，有整個西方世界在後面撐腰，他們是在執行西方的、基督教的全球擴張戰略，在推進西方的價值觀念，這表現在和平獎過去百年的獲獎者當中，以來自英國的、美國的，或者是來自英聯邦國家的人士居多，三者相加為34人，其次就是來自歐洲國家的

人士，再次是英、美覬覦垂涎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或地區。第一、第三類相加超過了全部得獎人的四分之三！

這種頒獎分佈的算計背後就是邱吉爾在1948年10月9日提出的“三環外交”戰略構想，即：英聯邦和大英帝國為第一環；英國同加拿大、澳大利亞及其美國等同文同種的盎格魯——薩克森人所組成的英語世界為第二環；聯合起來的歐洲則算是第三環。邱吉爾提出“三環外交”構想的如意算盤是：以第一環英聯邦和大英帝國作為英國謀求世界霸權力量的基礎，利用第二環英、美的特殊關係，借助美國的力量來重建大英帝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進而利用第三環裏聯合起來的歐洲，謀取西歐的領導權，再利用整個西歐的力量來對付前蘇聯。

如果把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的得獎分佈統計跟這個戰略相比，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高度重疊，而這種“雷同”並不是“純屬巧合”，而是明白昭示出這兩個獎項為英、美製造輿論、打擊對手，哄抬道德聲勢，陷對手於不義的政治傾向；人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大英帝國那隻看不見的手，通過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在背後巧妙地、不露聲色地在操縱、左右著世界輿論，強化以新教信仰為特徵的西方價值觀念，以此塑造新的政治認同。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都是政治性的大獎，它們互為補充；頒獎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引導世界輿論關注熱點地區和熱點議題，而獲獎者本人的成就大小、高低、對世界和平或文學的貢獻反而是次要的。我們只要比較一下1944年10月9日邱吉爾在訪問前蘇聯，跟史達林談判兩國在戰後劃分巴爾幹半島的勢力範圍時所出示的那張百分比分贓圖，和戰後這一地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分佈，就不難看出兩者的重疊絕非巧合。對國際關係史稍微有點瞭解的人們，不會忘記英國在近一個世紀以來對西藏的覬覦和垂涎、英國同阿根廷的領土爭端；英國與印度、緬甸、印尼、以色列的宗主國與殖民地關係，英國與法國和日本的明爭暗鬥。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如索因卡、帕穆克等也是來自英聯邦國家或英國前殖民地、覬覦的戰略要地，都是反政府、反當局、反權威的異議人士。這些事實，昭示了英國人利用諾貝爾和平獎主導世界輿論話語權的陰謀。

和平獎和文學獎頒獎集中在邱吉爾提出的三環外交國家，明白無誤地證明和平獎和文學獎的政治傾向。由此，人們可以看穿，諾貝爾和平獎本質上是姓“英”而不姓“挪”，也不姓“美”，更不姓“諾”。

（三）諾貝爾和平獎在促進重要戰略國家轉型時的頒獎模式

諾貝爾獎在促進非西方國家向接受西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價值回歸和制度轉型的時候，確立了一種先給文學獎、再給和平獎的模式，以此規範非西方文明國家的轉型和發展方向。在本書所介紹的八個國家中，除了南非和埃及是先贏得和平獎以外，其餘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先給文學獎再給和平獎。正是在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的一貫堅持和不斷努力下，南非、波蘭、愛爾蘭、日本等國家才最終改“邪”歸“正”，接受西方的價值、文明和制度，投入西方陣營。本書詳細介紹了西方國家對那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的爭奪過程，它們既堅持，又耐心，其間，日本用了54年（1945—1994），愛爾蘭用了36年（1969—2005）才完成轉型，南非用了33年（1960—1993），前蘇聯則用了67年（1933—1990），而波蘭僅僅用了10年（1980—1989）。也因為這些國家完成了向西方文明和西方價值觀念的回歸，可以預料的是，未來這些地區的人士獲得和平獎的機會就微乎其微了。

現在，已經沒有誰會懷疑波蘭、南非、希臘、日本和俄羅斯的“西方”屬性了，而且，日本還跟俄羅斯一樣，成為“八國工業集團”的成員。更富戲劇性的是，北愛爾蘭共和軍在進行30年武裝鬥爭後，居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北愛爾蘭新芬黨在2005年7月28日明確宣佈北愛爾蘭共和軍放棄暴力手段，改循政治與民主途徑來達成想要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先獲得和平獎的國家則還需再頒授文學獎予以強化，以證實他們具有跨入西方文明俱樂部的資格，韓國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過去十幾年，韓國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了民主化的過程，現在正在步日本的後塵，夢寐以求西方人的承認和接納，以躋身“西方文明世界”為榮。因此，在金大中於2000年獲得和平獎以後，再向韓國作家頒授文學獎，以此肯定其“加入西方文明世界”的努力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明白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出為什麼捷克當代小說家、真正名副其實的米蘭·昆德拉屢屢被拒於文學獎之外，《撒旦詩篇》的作者薩爾曼·拉什迪也被排除在名單外，而韓國詩人高雲、印尼小說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敘利亞詩人阿里·艾哈邁德·賽義德、阿爾及利亞小說家兼詩人阿西婭·傑巴爾、尼日利亞詩人兼小說家班歐克里和奇努亞·阿切貝、摩洛哥小說家塔哈爾·本·傑倫、索馬里作家努魯丁·法拉赫、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雷、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秘魯裔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羅薩等一票作家卻能夠在一夜之間走紅，莫名其妙地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在文學界裏變得炙手可熱、身價倍增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9·11”，小布希要釜底

抽薪，“在大中東地區推進民主建設”的宏偉計劃的話，上述中東地區作家要鯉魚跳龍門談何容易！

(四) 認清和把握中國和平崛起的政治資源優勢

在過去幾百年裏，無數哲人睿者從歷史、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角度來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他們或是以經濟發展、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總結歷史發展規律，或是以意識形態、文明衝突的立場來解釋社會發展，卻鮮有從宗教信仰以及種族矛盾的角度來總結歷史發展經驗。事實上，西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羅馬兩個帝國和1054年東正教同天主教爭奪正統，並非由於階級矛盾，也不涉及領土爭端和經濟利益衝突，它們都屬於同一種基督教文明。16世紀馬丁·路德揭竿而起，反對羅馬教會，導致基督教第二次大分裂，也是歐洲國家民族之間的鬭牆之爭。基督教會這兩次大分裂，奠定了此後歐洲國家三大民族分屬三大宗教的基本格局。在新教和羅馬天主教爭奪過程中，中歐一些互為矛盾的種族和地區被劃為同一個教區，它們分別按拉丁儀式和拜占庭儀式接受基督教，融合進歐洲文明。這一過程，使得斯拉夫人在日後分裂成天主教和東正教兩大集團。波蘭、波西米亞、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人作為斯拉夫民族卻信仰天主教，這就使得他們跟其他信仰東正教的斯拉夫人國家頻起衝突。反過來，羅馬尼亞作為拉丁民族區卻皈依東正教，而科索沃人身在歐洲，也陰差陽錯，變成伊斯蘭教徒，成為東正教地區兩個醒目突兀的異數，所以他們得不到其他天主教國家的信任。這種種族和信仰的“錯位”，是造成過去千年歐洲動盪不安、雞犬不寧的深刻根源，更是我們分析歐洲兩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和觀察近年來前蘇聯境內“顏色革命”不斷的基本出發點和主要思維參照。2003年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和2004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之所以發生，原因很多，但如果我們被西方媒體編造的“爭取民主和人權”等等騙人的口號完全蒙蔽，看不到在這些美麗、崇高字眼掩蓋下的歐洲三大宗教爭奪勢力範圍的殘酷現實，實為大謬不智。

本書通過深入分析歐洲三大民族和三大宗教在過去百年中的激烈爭奪和生死較量，旨在證明，過去幾個世紀國際政治格局的發展變化和各個大國的興衰沉浮，雖然有意識形態的作用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但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宗教信仰和民族利益的爭奪。過去百年裏各種“主義”的論爭，不管多麼冠冕堂皇，其根源皆出於此。

近年來，國內在宣導“和平崛起”理論，以回應國際上種種反華、

仇華勢力所散佈的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表明中國宣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決心和願望，但國內理論界卻沒有分析、指出什麼是有利於中國崛起的內部客觀環境，所以也就沒有回答為什麼中國的崛起反而會被西方國家認為對他們構成威脅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填補這個理論空白，本書著重分析了歐洲三大民族和三大宗教之間的矛盾本質以及它們之間延續千年的衝突和爭奪的歷史，旨在證明，中國不屬於歐洲三大民族中的任何一個，中國對歐、美國家也不具備宗教信仰基礎上的威脅，這是中國跟前蘇聯和印度的最大不同之處，是中國崛起的有利外部條件，也是中國享有的最大一種政治資源優勢。認清這一點，有助於我們認清和把握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調整自己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韜光養晦，以逸待勞，爭取和平發展的空間和時間，對西方媒體頻頻以“民主”、“人權”、“環保”等等藉口不遺餘力地妖魔化中國泰然處之，避免跟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發生直接的、不必要的對抗，在複雜的國際政治發展中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爭取一個和平的有利的國際環境。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歷，特別是在經歷了2008年的南方冰雪災害和汶川地震、經歷了2008年發端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後，事實證明了這種制度的優越性。中國人民有權利、有理由自己選擇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人民也願意虛心學習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但會婉拒西方國家的說教，更沒有理由去跳由居心叵測的人所佈置的陷阱和火坑。

當今國內各種論述當代國際關係歷史的書籍，囿於材料、語言或觀點的限制，它們多圍繞於蘇、美兩國或歐、美雙方的爭奪，從傳統的“高政治”角度來論述，但對一些中、小國家，特別是北歐等小語種國家對當今國際政治大勢的影響，則鮮有論述。歷史的發展並非是簡單的、線性發展，事實上，北歐國家在過去一個世紀的發展，對當代國際關係產生了重要的規範作用。本書試圖從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頒發的角度，以新的史料，回答冷戰當中和冷戰以後國際關係發展變化當中提出的一些諸如“人權”、“民主”和和平等概念的重大理論問題，在注重趣味性的同時，兼顧資料性和工具性，以圖為國內研究戰後國際關係史，特別是後冷戰歷史填補一段空白。

教皇保羅二世逝世引爆的話題

羅馬天主教會教皇^①約翰·保羅二世^②在經過漫長的與病魔搏鬥和掙扎後，終於在全球矚目之下，在2005年4月2日晚，以84歲高齡撒手人寰。遍佈全球的十億虔誠的天主教徒，無不對教皇的逝世表示悲慟和哀悼；其他具有各種各樣信仰的非天主教徒也基於人道理由，對一個鰥寡老人的去世表示深切同情；西方各國政要和領導人出於各種各樣的目的，也爭先恐後對教皇去世發表溢美之詞。以新保守主義傳人自居的美國總統布希父子，更是不辭勞苦，飛越半個地球，親赴梵蒂岡向教皇遺體告別。就連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等等激進的、原教旨主義的宗教組織領導人也都紛紛發表唁電和聲明，對約翰·保羅二世表示哀悼。唯利是圖的主流媒體不敢稍有怠慢，在教皇去世至出殯的那幾天，西方媒體推出了鋪天蓋地的阿諛奉迎報導；教皇去世的新聞更是充斥著每一個電視頻道和電臺波段，在那幾天裏，人們的感覺不是“教皇死了”，根本就是“天塌了！”在那段時間裏，無論何時何刻打開電視，一定有一台在報導梵蒂岡聖伯多祿^③廣場前徹夜不散的百萬人潮。電視機裏，虔誠的教徒如喪考妣，痛不欲生；麥克風前，男女老少痛哭零涕，哀嚎不已。教皇保羅二世以其在位27年的歷史，為羅馬天主教會、在20世紀最後動盪的20年當中樹立權威和凝聚人心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逝世，在精神和政治領域裏所造成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羅馬天主教一個教會的範圍，它象徵著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擺脫前蘇聯的控制、向資本主義過渡、回歸西方價值體系的過渡時代的結束^④。在媒體這種一面倒的煽情哄抬下，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上朝聖的人群——其中絕大多數是來自教皇家鄉的波蘭同胞，更是群情激動，不能自己。他

① “教皇”在拉丁文裏稱 papa 或 pontifex，是羅馬天主教會的最高領袖，港、台等地不懂宗教的人望文生義，把 papa 或 pontifex 譯成“教宗”，這是一種莫大的誤解。因為按照《聖經·馬太福音》16:18節，耶穌對聖伯多祿說：“你是伯多祿(石頭)，我要將我的教會建立在這磐石上。”據此，可以認為聖伯多祿是羅馬第一位主教，而伯多祿其後的繼承者們才是被稱為 papa 或 pontifex 的人，也即“教皇”，是屬於第二位的。正因為這樣，pontifex 不能譯為“教宗”。另一方面，基督教產生於基督，教會是在基督升天、聖靈降臨後才有的事。耶穌降生後，猶太人還是信《舊約》，耶穌傳道招收了12個門徒，但耶穌當時還沒建立教會。只有到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復活升天，聖靈降臨後，教會才成立，教會始於《使徒行傳》第2章。而天主教更是從君士坦丁以後、從大格利高里(Gregory I)在西元590年當教皇時才開始的，所以，只有耶穌基督才能稱為“教宗”，而歷代天主教皇只是教廷的領導人。保羅二世尚未被封聖，連“聖人”都算不上，當然不能稱為“教宗”。

② 約翰·保羅二世的拉丁語原文為：Ioannes Paulus PP. II，所以港、台等地多譯作“若望·保祿二世”。

③ 拉丁文 petros 是石頭、小石的意思，而磐石、大石則是 petra，就是基督（林前10:4）。Petros 在天主教裏按其發音譯為“伯多祿”，典出於《馬太福音》16:17-19節，耶穌對彼得說，他要把教會建立在彼得所承認的基督（磐石）上，而不是要建立在彼得身上。新教誕生以後，因為用的不是拉丁文，所以 petros 轉化為其他語言，稱為 peter，在基督教新教裡翻譯為“彼得”。許多人不懂得天主教和新教的區別，只按照中文翻譯習慣，把梵蒂岡的“聖伯多祿廣場”誤譯成“聖彼得廣場”。

④ David Morris (2003): “The Totalitarian Pope”, AlterNet. October 20, 2003. <http://www.alternet.org/story/16994/>

們揮舞著波蘭國旗和寫著“立即封聖”的標幅，大聲呼喊“封聖，封聖”，要求給保羅二世封聖。教廷裏邊的樞機主教們，為了確立自己的嫡系地位和排擠、打擊對手，特別是來自拉美地區的候選人，也爭先恐後向故去的教皇獻媚輸誠。保羅二世屍骨未寒，梵蒂岡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Cardinal Angelo Sodano)，在未經教廷內部討論、協調的情況下，就搶先在為保羅二世安魂彌撒寫的書面佈道稿中把保羅二世稱為“偉人”(The Great)，而這是在天主教過去900年的263位教皇裏，只有三位中世紀時的教皇才享有的榮譽，這一次則是第二個千紀以來的第一次。在這種炒作哄抬下，教廷內外都不能自己，一時間，教皇保羅二世似乎真的成了人世間至高無上的聖靈，傲視蒼生，一塵不染，在芸芸眾生的頂禮膜拜中展現出完美無缺的人格品德，鮮有人敢懷疑保羅二世是過去27年裏全球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最丟人的是，就連國內那些自詡為“獨立”的知識份子也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盲目起哄吹捧道：“在這位精神領袖的引領下，現在的羅馬教廷已經變成推動全球自由、捍衛世界和平的偉大精神力量”。還有另外一些抬轎子、吹喇叭的評論家也走火入魔，無限上綱地把保羅二世跟邱吉爾和羅斯福相提並論，認為他們都是駕馭時代風雲、左右歷史發展的人物。美國新保守派陣營的喉舌《旗幟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主編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紐約時報》個人專欄上煞有介事地宣稱，“教皇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聖地牙哥聯合先驅報》(The San Diego Union Tribune)更是斬釘截鐵地吹捧道“教皇無疑是20世紀最高聳入雲的豐碑，無人能質疑這位教皇的道德力量。^⑨”在4月8日在梵蒂岡舉行的葬禮上，人們對教皇的崇拜之情沸騰到了極點。義大利首都羅馬湧入超過200萬的天主教信徒，其中獲准進入聖伯多祿廣場的也有數十萬人之多。在2500多名出席的貴賓中，包括了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安南、美國總統布希、英國首相布雷爾以及4名國王、5名女王在內的70多個國家的總統、總理、首相或特使，他們同幾百萬天主教徒、高級神職人員一起，參加這場世紀喪禮，全球則有20億人透過電視轉播觀看這場冠蓋雲集、哀榮備至、有史以來最隆重的葬禮和現代史上最盛大的宗教聚會。

與這場隆重葬禮所營造出來的一片歌功頌德和感恩崇拜的氣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遠在歐亞大陸邊緣的挪威奧斯陸，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五個委員，卻有一種如釋負重之感——早在5年前，歐洲的天主教聯盟就針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運作一個強大的宣傳攻勢，他們千方百計游說

⑨ David Morris (2003): "The Totalitarian Pope", AlterNet, October 20, 2003. <http://www.alternet.org/story/16994/>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要求授予保羅二世以諾貝爾和平獎，以此褒揚教皇的豐功偉績。這是繼1995年歐洲天主教聯盟成功發動宣傳攻勢，提名東帝汶的天主教神父卡洛斯·貝婁(Carlos Filipe Ximenes Belo)獲得1996年諾貝爾和平獎（同另一異議人士、東帝汶“毛貝勒抵抗運動”全國理事會的特別代表、現東帝汶總統荷西·拉莫一索塔，José Ramos—Horta分享）之後，該聯盟發動的最大攻勢。教皇保羅二世於1920年5月18日出生於波蘭，至2000年時已經80歲，且屢患結腸癌和帕金森綜合症，他無時無刻不在與死神作鬥爭。熟識內情的人都知道，保羅二世風燭殘年，搖曳的生命燭光隨時都可以熄滅，而和平獎又不可能頒發給故世人士^❶，所以，在保羅有生之年給他爭取一個和平獎，對抬高羅馬教廷的聲譽、奠定整個天主教的地位來說意義尤其重大；特別是，在過去100年裏已經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宗教組織及其個人都曾經得到過諾貝爾和平獎，其中包括南非天主教圖圖(Desmond Mpilo Tutu, 1984)和印度德雷薩修女(Mother Teresa, 1979)，甚至還有伊斯蘭教的婦女艾芭蒂(Shirin Ebadi, 2004)，而作為天主教裏地位至高無上的“偉人”，教皇卻至今沒有得到這個殊榮，這不能不說是個巨大的遺憾。

但是，任憑提名者提出一千條理由來證明教皇保羅二世為世界和平做出了多少偉大的貢獻，所以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云云，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就是處之泰然，一點不為所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不願意仿照在1961年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死後追授和平獎的模式，甚至也不願意仿照1953年授予英國首相邱吉爾以文學獎，以鼓勵他在二戰中貢獻的模式，也給保羅二世一個文學獎來代替。這在波蘭一個專門寫科普文章的女作家辛波斯卡在1996年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況下，卻把在執掌教廷26年期間也喜歡謫幾首小詩，出過兩本詩集，甚至在1994年還以其自傳《跨越希望的門檻》(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Hope)一書，在全世界以50種語種版本售出2000萬冊而榮膺全球最暢銷作家之一的保羅二世本人拒之文學獎門外，委實讓教皇很沒面子。

要探究保羅二世連續五年被提名，卻一再被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拒絕的根本原因，我們不能不追溯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的歷史，深入瞭解和平獎獲獎者的產生過程；瞭解這樣一個在國際社會裏呼風喚雨、引領風騷的百萬美元大獎，其得獎人的評選產生機制及其評選標準，分析挪威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各種各樣的政治、歷史、人文、地理等等因素對評審和平獎得主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和平獎頒獎對推動國際政治潮流、在國際

❶ 在和平獎過去百年頒獎歷史上，只有一次破例，那就是1961年授予在當年被謀殺的前聯合國秘書長、瑞典籍的哈馬舍爾德。